

关于向计划经济转型动力的经济学解释

汪立鑫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向计划经济转型的实际动力在于,对于市场经济制度下那些收入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低收入群体而言,具有平均分配倾向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预期更好的制度,因而推动向计划经济的转型可能是其理性选择;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与工人运动的起伏变化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在进行“滞后”修正后,这两个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向计划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4)09-0103-10

一、引言

为什么会向计划经济体制^①的转型?从西方主流经济学观点来看,市场经济制度是最理想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是低效的、明显劣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哈耶克更是将向计划经济的转型称之为“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1997a),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上个世纪的人类社会中曾经有相当比例的群体仍然执着地选择这条转型之路?从地理环境及历史文化的角度,有学者曾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的独特见解,如《东方专制主义》的作者魏特夫(Wittfogel,1989)就认为,古老东方国家面对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为了集体生存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治水社会,由此逐渐形成了东方国家的专制主义传统,而计划经济体制在东方国家的流行不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而已。

我们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来解释向计划经济的转型。基于这一研究方向,我们所提出解释的核心思想是,当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以至于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其收入水平远在平均收入水平之下,此时以平均分配为其根本特点之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对这些成员而言是预期更好的制度,这样向计划经济

收稿日期:2004-04-20

作者简介:汪立鑫(1966—),男,安徽安庆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体制转型的动力源就形成了,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入地阐述。

本文首先严格以经济理性人假定为基础,提出了两个有关个体理性选择模型的设想,以说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状况下,低收入群体倾向于选择计划经济制度的动力。然后,本文还对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工人运动的起伏变化进行了简单的实证分析,并初步验证了这两个变化之间在进行“滞后”修正后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最后两部分是进一步的讨论,分别就向计划经济转型的成功可能性问题以及如何理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问题进行了提示性的探讨。

二、向计划经济转型的动力——基于个体选择行为的两个模型

以下的讨论以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为基础。我们假设,当且仅当社会成员预期一种新的制度与当前的制度相比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效用,该群体将有动力推动这一新制度对当前制度的替代。因此本文的理解是:社会成员参与某种社会活动动力的大小由该社会成员愿意为之付出的成本来衡量。以上述假设为基础,本文提出关于向计划经济转型动力的两个模型,这两个模型的惟一差异在于是否承认“自由”本身对于社会成员具有直接的效用价值。

(一)模型I——个体在“自由”与“保障”两种“商品”之间的最优选择(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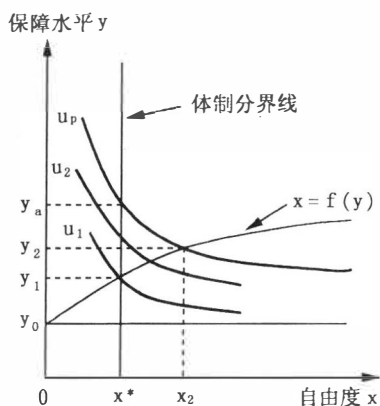


图1 个体对体制的选择:在“自由”与“保障”之间的权衡

1. 保障水平 y 。我们将个体在某一特定经济体制下的预期收入在进行预期风险折扣后的确定性等值定义为个体预期在该体制下可得到的保障水平。令维持个体最低生存所需要的收入水平为 y_0 。假定前计划经济中的个体预期在计划经济中会实行基本平均的分配方式,那么预期的保障水平等于当前的社会人均收入 y_a 。

2. 自由度 x 。指个体在某体制下所能享有的自由程度。按照哈耶克对自由的理解,自由是指免于受他人强制的自由,即“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

(哈耶克,1997b)。本文的自由主要是指经济自由,即个体在某种经济体制下所享有的不受强制的经济决策权,主要包括自由择业权、自由交易权与自由创业权。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要五层次论(马斯洛,1987),人类在满足了生存、安全之类的基本层次需要后,将会产生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而本文认为人们所获得的自由程度直接决定了这些高层次需要的满足程度,因此本文假定自由本身也能给个体带来效用,因为它能满足人的自尊需要

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显然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能给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经济自由。令计划经济所能提供的经济自由度最大值为 x^* 。

3. 市场经济中个体实际享有的自由度与个体实际收入水平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x=f(y)$ 。从理论上说,市场经济给个体所提供的经济自由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个体实际所能享用到的自由“商品”——即个体对上述经济自由权实际运用的程度 x ,则主要取决于个体实际所拥有的收入水平 y ,前者是后者的增函数,即:

$$x=f(y), \quad dx/dy>0 \quad (1)$$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低收入个体而言,市场经济体制中无限可能的经济自由所能带来的实际效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有限的收入首先主要用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自由创业、自由择业、自由交易均需要一定的个人财富作后盾,对于低收入个体而言实际上留下的自由选择空间很小,因而也难以享受到经济自由。如图 1,当个体的保障水平仅能维持最低生存时($y=y_0$),个体实际所能享用的经济自由权程度近乎等于零,即 $f(y_0)=0$ 。同时令:

$$y_1=f^{-1}(x^*) \quad (2)$$

则在 $y < y_1$ 时,均有 $x=f(y) < f(y_1)=x^*$,即前计划经济中实际收入低于 y_1 的个体所能享用的自由度均小于计划经济所提供的自由度。

4. 由“自由”与“保障”两种“商品”所决定的个体的效用函数 $u(x, y)$ 。这里仅考虑“自由”与“保障”这两种“商品”拥有量的变化对个体效用的影响,并假定个体所拥有的其他商品不变。这样可设由“自由”与“保障”两种“商品”所决定的个体的效用函数如下:

$$u=u(x, y), \quad \text{并设 } u_x>0, u_{xx}\leq 0, u_y>0, u_{yy}\leq 0 \quad (3)$$

由上式可得出相对于任一给定效用 u_0 的无差异曲线:

$$u(x, y)=u_0, \quad u_0 \text{ 为任一正的常数} \quad (4)$$

对于上述无差异曲线由(3)式容易证明:

$$dy/dx>0, \quad \text{再设 } d^2y/dx^2\leq 0 \text{ (即 } x \text{ 对 } y \text{ 的边际替代率递减)} \quad (5)$$

由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知,上述(3)、(5)两式的假设是可以接受的。同时由于这里曾设定维持个体最低生存需要的收入水平为 y_0 ,因此对于(4)式所表达的无差异曲线我们还有如下规定:

$$y > y_0, \quad \text{当 } y \rightarrow y_0 \text{ 时,有 } dy/dx \rightarrow 0, \text{ 即 } x \rightarrow \infty \quad (6)$$

这样根据(5)、(6)两式可得出个体在“自由”与“保障”两种“商品”之间进行选择所形成的无数条效用无差异曲线的基本形状(如图 1 中曲线 u_1 、 u_2 、 u_p 所示)。显然(x^* , y_a)为预期的计划经济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商品”组合(这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中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的状况及享有经济自由的“平等性”),这一商品组合决定了这些成员预期在计划经济中所得到的效用水平,令 $u_p=u(x^*, y_a)$ 代表这一效用水平,与这一效用水平相对应的无差异曲线 u_p

(如图 1 所示)由下式表达:

$$u(x, y) = u_p \quad (7)$$

显然,如果在前计划经济中某一成员实际所得到的效用水平低于这一水平,则该个体就有动力推动制度向计划经济的转型。为求出更具体的条件,联立(1)式和(7)式可解得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个体为实现效用水平 u_p 所必须达到的保障收入水平及这一收入水平所决定的自由享用程度,即:

$$y = y_2, x = x_2 \quad (8)$$

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保障收入水平低于 y_2 的个体其实际所能实现的效用水平均低于 u_p , 因此就有动力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当其保障收入水平与 y_2 的差距足够大时,该个体就有可能将革命的动机付诸于行动,随着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加剧,这样的个体足够多时,就可能孕育一场向计划经济转型的革命,并在一定的外生条件配合下,革命有可能成功。于是,保障收入水平 y_2 就成为前计划经济中社会成员是否愿意参与这一革命的分界线。

(二)模型 II——个体对不同体制下预期收入的比较

这是比第一个模型更为简化的模型。假设个体对经济自由是中性倾向的,即认为自由对个体不具有本原价值,只具有派生性或工具性价值,在个体看来,经济自由只有在能够为个体带来提高预期收入时才对个体具有效用价值。因此个体对经济体制的选择将主要基于预期收入的标准。可以将本模型看成是模型 I 的近似和简化,但本模型在数学处理上更容易一些。

撇开数学形式^②,简单来说,本文关于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力”的理解,可以将社会成员的选择动力定义为该成员为推动计划体制的实现所愿意支付的成本,这一愿意支付的成本等于该成员在两种体制下预期未来收入总现值之差。因此,向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推动动力的大小根本上取决于前计划经济中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程度的大小,低收入阶层的民众越多,其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差距越大,则社会总的革命动力也就越大。

三、实证检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与工人运动的起伏

(一)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

1. 库兹涅茨倒 U 型收入差距变化假说。1955 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论文(Kuznets, 1955),提出了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呈倒 U 型变化的假说。他的观点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假定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快速扩大,接着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阶段逐渐缩小。”库兹涅茨引证了一定的统计资料以支持他的上述倒 U 假说,他所引用的统计数据表明,在 1880 年至 1950 年的考察期内,美、英及德国萨克森地区的收入差距开始由原来的上升趋势转入下降趋势。

此外,库兹涅茨还试图对上述的收入差距倒 U 型变化给予理论上的解释,但由于其论证不充分及逻辑上的不严密,因而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2.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发展经济学中由刘易斯最先提出的“二元结构劳动剩余”模型(刘易斯,1989)对上述收入差距倒 U 型变化趋势给予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解释。这一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以致现代工业部门能在不变的低工资水平上源源不断地得到劳动供给,从而使资本积累不断扩大。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并从两方面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是随着现代部门的扩张,资本所有者队伍的增多及其所拥有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所有者的资本收入不断提高,而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则基本不变,由此形成二者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二是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因两个部门劳动工资的差距(这一差距是劳动力不断转移的前提)所产生的劳动者收入差距在统计学上也越来越明显。以上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结构转型的后期将会反向逆转,即随着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张,最终所有的剩余劳动力都被现代化部门所吸收,以致于劳动力逐渐变为稀缺要素并促使劳动工资增加,而资本则变为充裕要素导致资本收益下降,于是收入差距由原来的趋于扩大变为趋于缩小^⑤。

3.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1975,中译本)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根据他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观察提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马克思指出,市场竞争迫使资本家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不断采用新技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所形成的资本积聚和资本之间的吞并联合所形成的资本集中,导致了个别资本规模的扩大,这也为资本家不断采用新技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创造了条件。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势必一方面会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和产业后备军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压制了工人工资的增长。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在资产阶级一方表现为资本和财富的迅速膨胀过程,而在无产阶级一方则表现为贫困的积累过程,即表现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由上可见,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机制。

综上所述各种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与本文主题相关的两点结论:首先,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必然有一个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但随着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完成,收入分配差距将会有所缩小;其次,具体到西方主要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大约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然后收入分配差距开始缩小。

(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人运动的变化

这里所指的工人运动含义较广,泛指所有的低收入群体所发起的各种抗议行动,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及相关的示威、起义及革命等行动。为了分析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人运动的变化趋势,本文先根据德国历史学家维尔

纳·施泰因(1992)所编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政治和军事分册),将近、现代发生在欧美国家的主要的低收入群体反抗事件列出大事记年表^①,然后再根据这一大事记年表,分不同的时间段(10年为一个统计时间段)来统计工人运动的发生次数,并列表1。

表1 欧美国家近现代不同时间段工人运动发生次数

时段	1821 1830	1831 1840	1841 1850	1851 1860	1851 1870	1871 1880	1881 1890	1891 1900	1901 1910	1911 1920	1921 1930	1931 1940	1941 1950	1951 1960	1961 1970	1971 1980
次数	1	2	6	1	0	1	0	0	2	6	10	9	3	5	6	3

根据表1数据可作出如下的柱状图(图2),该图形象地表示了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人运动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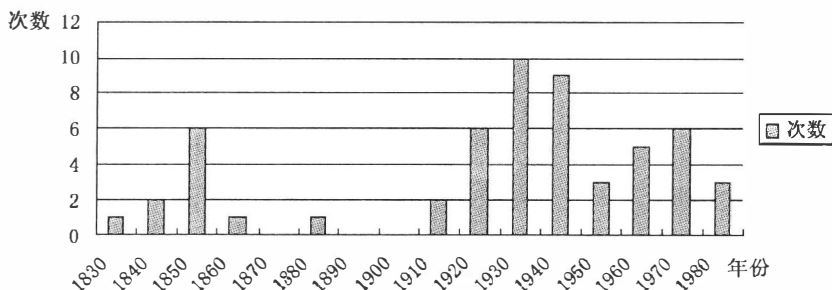


图2 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人运动的变化

(三)收入差距与工人运动的相关性

根据本节上面两部分的分析,可以初步探讨收入差距与工人运动之间的相关性。在西方主要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型变化大约发生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此时收入分配差距达到顶峰,然后收入分配差距开始缩小。而从图2又可以看出,在欧美国家,工人运动次数的变化也近似于倒U型,但其顶峰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然后工人运动的次数开始下降。

上述两个倒U型其顶峰时点大约错开了50年,对此本文的解释是,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引起一定程度的工人运动,其间要经历一个时间的延滞,因为工人运动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需要意识形态的动员来解决搭便车问题,而从收入严重两极分化的现状到诱发出强有力的反对现状的意识形态的创立、再到该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和动员并被工人所接受,这些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②。因此如果考虑到这些滞后效应,则收入差距的变化与工人运动频度的变化有着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

四、进一步讨论之一:向计划经济转型得以实现的其他前提条件

本文前面的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初期的收入两极分化有可能会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向计划经济转型的动力,因为经济两极分化趋于严重的局面使逐渐

增多的低收入个体越来越强烈地认为,计划经济制度下较为平均的分配将使自己的收入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因而参与向计划经济转型的革命行动并付出一定成本是值得的,这就形成向计划经济转型的革命动力。而且,经济两极分化的扩大将使这一动力增强,其社会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人运动的不断爆发,这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历史中已得到印证。

然而,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要获得成功,除了经济两极分化背景这一根本条件之外,还应视具体的实际的历史情形而定,即虽然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爆发过社会主义性质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但为什么最终只有相对落后的俄国与中国等才成功地自主实现了向计划经济的转型?

对上述更深入的问题的回答虽然不是本文设定的主要任务,但这里我们可以对之稍作提示。

(一)富人群体控制政权的暴力潜能受到削弱

从逻辑上看,在市场经济初期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低收入群体在进行经济制度博弈时有三种“博弈行为”可选择,一是安于现状不作任何反抗;二是通过武装斗争、以彻底的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政权,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制度,实现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三是走“社会民主主义”式的“中间道路”,即不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而是发起和参与要求在现政权框架内进行各种社会“改良”,争取和扩大自身的政治与经济权利的社会运动,而随着这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由于低收入群体的人数众多使其总体投票权重较大(如果一人一票的话),因而其在现政权中的政策影响力将加大,具体而言就是能够影响现政权调整其财政税收政策及其他收入政策以强化其收入再分配功能,如通过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及对穷人的转移支付等,以实现更为平等的分配,降低社会两极分化^⑥。

而最终低收入群体是否选择上述第二条道路,即采取向计划经济转型的革命行动,则进一步取决于另一根本条件——富人群体所控制的现政权的暴力潜能受到了暂时削弱。因为现政权(即富人政权)的暴力潜能是否受到暂时削弱决定了低收入群体能否在暴力潜能上占据充分的优势。如果低收入群体在暴力潜能上不占据充分优势,即低收入群体即使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但将要为之付出极大的代价,以至于其最终获得的净收益反而低于发动“改良”运动所获得的净收益,那么低收入群体的理性选择将不是革命行动而是非暴力抗议行动。只有在低收入群体占据充分的暴力潜能优势、从而预期能以足够低的代价取得革命胜利的情况下,选择革命行动才是低收入群体的理性选择,这时的“革命形势”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然而大规模有组织革命行动的爆发及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还有赖于克服一个关键难题,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的有效解决,这就涉及到下面所分析的第三个根本条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对低收入群体的充分动员。

(二)低收入群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充分有效动员

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必须通过集体行动来完成,而且参与社会革命对任何个人而言无疑都是充满风险的活动,这些均使得参与革命行动的个人有着极大的搭便车动机。因此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充分动员,社会革命的集体行动就可能因个体的搭便车行为而瓦解,大规模的革命行动不仅难以爆发,而且更谈不上走向成功。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才能引导出强有力的社会革命行动,而对于旨在向计划经济转型的社会革命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最具激发力的思想武器^⑦。

然而正如我们曾指出的,意识形态从萌发到最终对社会群体发挥动员作用往往要经历一段时间滞延,而这就有可能导致上述第三个条件(即意识形态条件)与前两个条件(两极分化条件与暴力潜能对比条件)并不能配合,即当意识形态能够发挥作用时,向计划经济转型的另两个条件——两极分化条件及暴力潜能对比条件可能已经消逝。这正是率先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在向计划经济转型问题上的“悖论”^⑧。而俄国与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地实现向计划经济的转型,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并不存在上述的“悖论”,即前述的三大条件在这两个国家的某一时期能够同时配合。

五、进一步讨论之二:如何解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与本文主题相联系的另一问题是:既然在有些国家出现了向计划经济的转型,那么同样是在这些国家,为什么后来又纷纷出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里我们同样只是简略地勾划一下我们对此问题回答的基本思路。在我们看来,计划经济制度建立后,制度博弈将在全新的格局下进行。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初期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背景下,制度博弈主要是在低收入群体与富人群体之间展开的,那么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度博弈则主要在最高执政者、特殊利益集团以及普通民众之间展开,在这一新的博弈格局下,逐渐会形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动力,而且不同的初始条件会导致不同的转型路径。

(一)计划经济制度建立与演化的内在逻辑

社会主义革命一旦胜利,向计划经济的过渡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制度变迁方向;而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势必内生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与林毅夫等(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所理解的决定顺序刚好相反;这一发展战略因背离了后发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而导致产业结构扭曲,从而因经济增长潜力未能充分利用、重工业发展的后续投资日渐枯竭以及需求约束趋于紧缩而致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计划体制在微观机制上的低效率,使经济困境更快地降临。

(二)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型的方式:渐进与激进改革

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一旦启动,改革的命运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特殊利益集团阻力的大小：如果改革启动时特殊利益集团的阻力较弱小，则渐进改革将会较为顺利地逐步深入，并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如果改革启动时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已较强大，则渐进改革将在第一阶段即局部“放权让利”阶段陷于长时间停滞，而当这一改革停滞因经济形势所迫及新的执政者的上台而被打破时，则可能迫使改革转向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

注释：

- ①我们所说的计划经济体制特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即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就避免了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计划化相混淆。
- ②关于本模型严格的数学表达，可详见汪立鑫(2002)。
- ③参见汪立鑫(2000)的有关评析。
- ④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列出大事年表的详细内容，有兴趣者可与作者联系索取该资料。
- ⑤关于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延滞性参见汪立鑫(2002)的有关论证。简单说来，意识形态从萌发、创立到为相关的利益群体所接受并发挥作用，需要经历三个环节：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经由某种特定社会状况所诱发；经过理论家的艰难探索，意识形态由简单的核心理念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在与其它可替代的意识形态的竞争中逐渐确立主导(垄断)地位，从而有效发挥其对相关利益群体的服务指导作用。以上三个环节均需经历时间，这就导致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时间滞延性。
- ⑥参见 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A. Robinson (2001)的分析，他们提出的模型的核心前提之一就是强调，与不民主的社会相比，在民主社会穷人要对富人征更高的税。此外，Dani Rodrik(1999)也表明，民主社会的工资水平及劳动工资收入的份额均会更高。
- ⑦作为一种号召低收入群体革命行动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与他之前及同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相比，无论是关于社会现状的不合理性方面，还是关于社会发展趋势方面的论证，都是极其出色和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低收入群体的意识形态，确实为该群体提供了从革命的合理正义性到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再到革命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全面、深刻的论证，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舞力，从而为低收入群体组织统一、强有力的革命集体行动提供了保障。参见汪立鑫(2002)的有关分析。
- ⑧具体到西方率先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当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终于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确立在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时，如本文曾讨论指出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差距已开始缩小，而在此之前，具体说到 1850 年以后工人工资一般来说也都提高了(帕尔默·科尔顿，1988，第 674 页)，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政权随着其稳定时间的增加，其所掌握的暴力潜能也在增强(我们可假定，资产阶级政权的暴力潜能与政权建立的时间呈正相关)，而且由于工人运动的压力，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开始作出让步，让工人开始拥有选举权，所有这些条件的变化，特别是收入差距条件及暴力潜能对比条件的变化，均使工人阶级革命的动力开始减弱，工人阶级转而倾向于通过议会斗争、通过社会改良等被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机会主义”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及收入水平。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刚刚开始工人在群体中确立主导地位就不得不面临与各种“修正主义”作斗争，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工人运动随之走向低潮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A·H·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3]卡尔·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3]帕尔默·科尔顿. 近现代世界史(三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5]阿瑟·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 [6]冯·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7]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册)[M].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8]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9]汪立鑫. 我国收入差别扩大的三大导因[J]. 经济学家,2000,(4).
- [10]汪立鑫. 经济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解释[D]. 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2.
- [11]Acemoglu, Daron, Robinson A.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5(4): 938~963.
- [12]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55, 45(1): 1~28.
- [13]Rodrik, Dani. Democracies pay higher wag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3): 707~738.

An Explanation of the Motive Force of Transition to Planned Economy

WANG Li-xi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actual impetus of transition to planned economy lies in such a fact that the planned-economic system with inclination of even distribution would be a better system in expectation for the masses of low income whose income was under average in market-economic system, and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to planned economy would be a rational decision for them. Empirical analyses also show that, after “lagging” is revised,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come unevenness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n Europ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in the U. S. A.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 income gap; masses with low income; transition to planned economy